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研究系列

■ 林毅夫/著

自生能力、 经济发展与转型 理论与实证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系列

自生能力、 经济发展与转型 理论与实证

■ 林毅夫/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生能力、经济发展与转型:理论与实证/林毅夫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9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系列)

ISBN 7-301-07789-0

I. 自… II. 林… III. 经济学:文集 IV. 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7932 号

书 名: 自生能力、经济发展与转型:理论与实证

著作责任者: 林毅夫 著

责任编辑: 张慧卉 任旭华

标准书号: ISBN 7-301-07789-0/F·092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em@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30672 编辑部 62752926

排 版 者: 北京高新特打字服务社 51736661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33.5 印张 548 千字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系列

总 序

自 1776 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经济学脱离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学科以来，研习者日众，影响日远，已经蔚然成为社会学科中的显学。经济理论是用来解释人类社会经济现象的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和任何其他社会学科的理论一样，经济理论来自于对人类社会经济现象的观察和总结，必须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而不断创新；经济学的理论也必须不断经受各种过去的和新发生的现实经济现象的检验，才能去芜存菁，知道何者可以暂时被接受、何者应该存疑或是被摒弃。从上述角度来说，中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进行的改革开放对当前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提出了许多挑战：不管是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明晰产权、现代企业制度，还是资源配置和流通领域的双轨制，这些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及其所伴随的问题，有不少是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所不曾预料到，也难以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的现象。但是任何经济现象背后总有产生这个现象的逻辑，对于不能用现有的经济理论解释的现象总可以构建新的理论来解释。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给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了一个大好的机会，是经济理论研究的全矿。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渐建立和完善，当代经济学在我国的影响也是方兴未艾。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现实的社会经济现象，进而运用理论、制定政策、改造社会，以推动社会的进步。随着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各种矛盾和利益交织在一起，经济现象越来越复杂。面对一个问题，何者为因？何者为果？推行一项改革措施对激励机制、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等在局部和整体上会产生什么影响？要是没有合适的理论作为分析工具，那就很难认识清楚，制定的政策不仅难以对症下药，而且还可能制造出更多新的问题。所以，根据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新现象，在经济理论上进行创新，不但是为了对当代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作贡献，也是为了推动中国改革和发展的



顺利进行,对此,中国经济学家责无旁贷。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10 年前在北京大学校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由我和几位接受过完整经济学教育的青年学者回国创立。虽然在国外工作可以有优越的研究条件和丰厚的薪酬,然而,国内改革开放在经济理论研究上提供的机会吸引着我们,我国在向市场经济体系转型过程中对理论创新的需求也激励着我们。我们希望通过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新体制、新理念聚集一群有理想、有热情、学有专长的经济学家,为中国经济学的教育、经济理论和政策的研究以及国家的现代化奉献一点力量。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 10 年来,研究人员从创立之初的 6 位增加到现在的 24 位,已经成为国内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基地。这 10 年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许多研究人员深入农村、企业等基层改革的第一线作了大量的调研,也参加了不少政府高层的政策研究和讨论,形成了许许多多分量、有鲜明观点、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的学术论文和政策报告。这些研究对我国的农村、国企、金融、财政、外贸、电信等领域的改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 10 年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还利用和国内外学术机构联系较密切的优势,邀请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包括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前来讲学和参加会议,深入探讨了金融体系、农村劳动力流动、城乡收入分配、土地、社会保障制度等我国改革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积累了许多简报和论文。这次,借 10 周年庆祝之际,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的学术成果、中心的简报、讨论稿等整理、汇编成册,作为一个系列出版。一方面,以此向关心、支持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各界领导汇报这 10 年来的工作;另一方面,也以此求教于海内外学界的专家,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吸引更多的国内外学者来关心、研究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问题。

就中国的历史长河而言,10 年只是一瞬;就中国的改革开放所提供的研究机会以及需要在理论上解决的问题而言,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 10 年来的工作也只是沧海之一粟。展望未来,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所有人员将会秉持 10 年前中心成立的初衷,和海内外学界的朋友携起手来为中国经济的理论和政策研究、为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而努力!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一定会迎来中华民族在 21 世纪的伟大复兴,也一定会迎来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

林毅夫

2004 年 9 月

前言

本书收集的 19 篇论文是近十年来我和我的合作伙伴发表于国内和国外经济学期刊上的理论和实证文章,是我们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经济发展和转型问题思考的一个结晶。文章发表的时间先后相差近十年,内容涉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绩效、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收入分配、金融结构、经济转型等不同的内容,但是其本体的理论逻辑是一以贯之的。以下先对这一理论作一简单的介绍:

一、理 论

据估计,在工业革命尚未发生的 18 世纪初,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只有 5 倍,但是到了 20 世纪末,这个差距扩大为 20 倍。^① 发达国家怎么继续发展以及发展中国家如何赶上发达国家,是现代经济学,尤其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前现代社会的漫长岁月里,大多数国家都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传统农业经济阶段,除了少数的统治阶层、工匠和商人,绝大多数的人以农业为生。在这样的社会里各种资源已经进行了最佳的配置(Schultz 1964),因此,只有依靠偶然的外生冲击,例如,工人或农民在工作中意外发现的新的更好的技术,或是作为 15 世纪地理大发现的副产品而从美洲带回欧洲的财富和新的更为高产、更为适应各种地质和气候条件的作物品种^②,经济发展水平才有可能提高。当时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平面的扩张、人口增

① 按 1990 年国际元的购买力平价估算,在 1700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低的非洲为 400 元,而最高的荷兰为 2110 元;在 1998 年,最低的非洲为 1368 元,最高的美国为 27331 元(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62 页)。

② 地理大发现是为了寻找到中国的海洋航线,发现的新大陆、带回美洲的黄金、新的作物品种等都是没有想到的意外收获。



加,经济总体规模扩大,但是人均收入基本不变(Kuznets 1966)。

工业革命以后,新技术发明的方式从经验上偶然的发现为主,转变为科学家在实验室里有意的实验为主(林毅夫 1994 年,第 10 章)^①,使处于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用增加新技术研发投入密度来提高技术变迁的速度成为可能,发达国家的技术变迁的性质从外生性变为内生性^②,技术变迁的速度加快,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不断提高,人均收入的增长也大为加快。以西欧国家为例,按 1990 年的国际货币元估算,公元 0 年到工业革命前的公元 1700 年,人均收入从仅 450 元增加到 1 024 元,1 700 年间人均 GDP 只增加了 1.28 倍,年均增长率仅为 0.05%。但是,从公元 1700 年到 1998 年将近 300 年间,人均 GDP 从 1 024 元增加到 17 921 元,增加了 16.5 倍,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0.97%。而且,这种增长呈现出加速的趋势,公元 1700 年—1820 年间的增长率为 0.15%,1820 年—1870 年间为 0.95%,1870 年—1913 年间为 1.32%,1913 年—1950 年间为 0.76%,1950 年—1973 年间为 4.08%,1973 年—1998 年间为 1.78%(麦迪森 2003,第 262—263 页)。

技术的不断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发展,尤其是人均收入不断提高的基础,对于生产中所用的技术已经处于世界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技术的创新只能来自于自己经由研究、发展的努力所得到的从无到有的发明。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无非是在下一期生产时所使用的技术比当期生产所用的技术效率高,然而,并不要求是最新的技术。对于所使用的技术和发达国家的技术有相当差距的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既可以和发达国家一样,来自于发明,也可以来自于引进发达国家已有的技术。当然,到底是自己发明好,还是引进好,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决定于成本和效益的比较。各种经验研究证明,总的来讲,新技术的研发投入大、成功的概率低,技术研发成功以后,能为市场接受、能够商业化生产的技术的比例也很低,因此,新技术研发的风险很大。相反,技术引进的成本和研发的资金投入相比较而言通常只是一个很小的百分比,而且,引进的技术必然是成熟的、

① 虽然在工业革命以前,许多农业新技术的采用(例如,从三田轮耕变为两田轮耕),与人口压力的提高有关,在技术的采用上确实有 Boserup(1965;1981)所主张的内生性存在,但是新技术的出现应该是属于外生的偶然冲击。

②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由于在生产中所用的技术处于世界技术水平的前沿,因此,技术的创新只能靠自己的发明;在工业革命以后,技术的发明又主要是依靠科研投入、干中学等而产生的,所以,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技术创新具有内生性。

为市场所接受、能够用于商业生产的技术,风险相对很小。对于任何国家而言,除非在生产中所使用的技术已经是全世界最新、最先进的技术,否则,在能引进时应当尽可能以引进为主来取得技术创新。发展中国家一般来说在各个生产领域所用的技术和发达国家都存在一定的差距,所以,发展中国家应该更多地依靠引进来取得技术创新。

在工业革命以前,各个国家基本上都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各国之间的交往很少。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产品生产的规模经济不断扩大,交通运输、信息传递等与市场交易有关的成本则迅速下降,越来越多产品生产的合理市场范围从满足国内扩大到多国,乃至全世界,国际贸易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按1990年国际货币币不变价估计的全世界出口总值,在1870年为503.45亿元,到1998年为58170.80亿元,增长了115倍,年均增长率为3.8%;而同期全世界的GDP只增长了30倍,年均增长率为2.7%。公元1870年,全世界出口总值为全世界GDP总值的0.46%,1998年则提高到17.24%(麦迪森2003,第165、259页)。

国际贸易范围的扩大、各国经济往来的频繁,增加了发展中国家了解发达国家的生产、技术、管理,以及各种有效制度安排的机会,为发展中国家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从而取得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便利。但是,国际贸易的扩大也同时要求各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必须按照各自的比较优势来组织生产活动。发达国家经过长期的发展和积累,要素禀赋结构的特性是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发展中国家则是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丰富,所以,发达国家在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则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所以,在开放的经济中,各国的产业结构应该内生决定于其要素禀赋结构。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按比较优势来决定其生产活动,选择其产业结构,那么,其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将会有最大的竞争力,可以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创造最大的剩余;同时,由于资本稀缺、资本积累的回报率高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提升的速度应该会高于发达国家,而且,当要素禀赋结构提升,内生地要求产业结构跟着提升时,可以依靠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速度也会高于需要自己发明技术的发达国家。^① 所以,工业革命以后的全球化趋势给发展中国家利用“后

^① 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要素禀赋的结构将会快速提升,产业结构与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小,技术的创新将需要越来越多地依靠自己的研发。



发优势”以赶上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契机。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经济是一种闭关锁国的经济,公元1870年日本的人均GDP约为西欧诸国的37%,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年,日本的人均GDP仍然仅为西欧诸国的40%,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50年为42%,此后日本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和技术引进的后发优势(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年,第4章),到1973年时日本的人均GDP和西欧诸国处于同一水平,1998年,日本的人均GDP则比西欧诸国高出了14%,达到了最发达的美国的75%(麦迪森2003,第262页)。

照说工业革命以后,任何发展中国家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日本一样,都应该可以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来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许多发展中国家沦为发达国家的殖民地,经济上遭发达的殖民国家的掠夺,未能有独立自主的政策来利用这一经济发展的契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主义风起云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多数的殖民地纷纷独立,在独立运动领袖的领导下开始了建国的努力,给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带来了新的希望,许多还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但是,不管是在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些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袖和社会精英并不了解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其实是内生地决定于其要素禀赋结构。他们看到了发达国家的生产活动集中在资本密集的重工业部门,采用的是最新的生产技术,因此,希望在资本极端稀缺的要素禀赋基础上,快速建立起一个完整的重工业体系,用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的话来说,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工业化就是要优先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苏联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斯大林领导下取得的成就,以及当时的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对此发展观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这种发展战略背离了比较优势的原则(Chenery 1961),同时,也失去了利用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赶上发达国家的机会。

当一个发展中国家采用了上述赶超战略时,由于违背了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作为这种赶超发展战略载体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也就是说,即使这种企业的管理是正常的,亦不能预期这种企业可以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利润率。所以,除非国家给予保护和补贴,否则这样的企业是没有人投资的,也不会有人长期经营下去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由于税收能力一般较低,推行这样的战略需要保护的企业太多,因此,只能靠行政干预,给予要优先发展的产业中的企业以市场垄断地位,并用行政手段压低利率、汇率、原材料价格等,降低这些企业的投入成本,并用行

政手段把这些价格受到扭曲的资金、外汇、原材料等直接配置到这些企业。这些行政手段,固然能把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建立起来,但是,在信息不对称、政府又不直接参与经营的情况下,到底需要给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多少补贴和保护才足够,不得而知。当因为任何原因,包括企业自己经营不善甚至因为经理人员的道德风险而有亏损时,企业会以保护、补贴不足为借口要求政府追加保护和补贴。在政府对那些企业的亏损负有责任而难以推卸责任时,就产生了预算软约束和各种寻租行为。在企业经常向国家要保护、补贴的情况下,政府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干预企业的经营,或是索贿、受贿的问题也就防不胜防。所以,这种战略固然能够把一些先进的产业建立起来,但是,必然地也会伴随着资源配置不当、微观经营混乱、经济总体发展绩效低的情形。

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也必然会失去利用后发优势,不断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来加速技术创新的机会。其原因在于新技术不管是自己研发还是从国外引进都需要有一定的资本投入,在赶超战略下,一个国家有限的资金都被动员到资金密集的赶超部门,以致这个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部门得不到资金的支持,因此,也就只能继续用传统的技术来生产。赶超的部门刚建立起来时,技术固然很先进,但是赶超部门的技术由于专利保护和发达国家的封锁很难不断引进,自己研发的资金投入需求大、风险高,在总体经济绩效差、剩余有限的情况下,对这类技术的研发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几年以后这些先进的产业部门也不再是值得骄傲的先进部门。结果不管是被抑制的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还是被保护的不具比较优势的赶超部门的技术创新都非常缓慢。

赶超战略不仅会影响到发展的绩效、技术创新的速度,而且,还会影响到收入的分配。除非像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消灭资本家,从而由国家直接投资,并以行政手段压低每个人的工资外,能够投资于政府要优先发展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不是富有的资本阶级,就是和政府领导人关系密切、能够从财政、从银行获得资金支持的裙带资本家。补贴赶超产业中不具自生能力企业的资金又只能直接、间接地来自于经济地位较低的工人、农民阶层。所以,推行这种战略的结果必然造成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相反地,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推行的是按比较优势发展的战略,在发展的早期多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那么,只能依靠劳动力获取收入的低收入人群就能够有最大可能的就业机会。这种战略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资本的快速积累,劳动力就会从相对丰富逐渐变为相对短缺、资本从相对短缺变为相对



丰富,从而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会不断提高而资本的相对价格不断下降。由于富人具有优势的资产,也就是资本的相对回报不断降低,而穷人具有优势的资产,也就是劳动力的相对回报不断提高,收入分配也就会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而趋于公平。

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和自生能力也对一国的最优金融结构及其演进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金融结构指的是直接融资(以股票市场为主)、间接融资(以银行为主)在宏观经济中的比例,以及间接融资中大银行和小银行等各种金融安排的比例。但是,不管何种金融安排和结构,金融的主要功能在于动员资金、配置资金和分散风险。在这三个功能中,配置的功能是最基本的。因为将有限的资金配置好了,不仅创造的剩余多,而且资金的回报高,动员起来的资金也就会最多。同样的资金如果配置到最有竞争力的产业部门中的最有效率的企业,风险也必然最小。但是,什么是最优的配置?所谓最优的配置应该是将资金配置到按要素禀赋决定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中具有自生能力、管理好的企业。因为相对来讲,这样的企业在国内、国外市场都会有最大的竞争力、最高的回报、最小的风险。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不同,而且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生产活动中资金需求的规模大小和技术创新的特性也不同。除了少数自然资源极端丰富的国家之外,在发展的早期具有比较优势的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部门,其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投资和流动资金所需的资金规模相对较小,技术创新以引进成熟的、有商业价值的技术为主,技术创新的风险小,这类企业所面临的最主要风险是企业家的经营能力。除了依靠自有资金和非正规金融机构外,最适合给这类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是地区性的中小银行。所以,在发展的早期应当发展以中小型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的积累,要素禀赋结构的水平不断提升,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的资本密集度不断提高,企业投资和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同时,技术创新也随之逐渐从引进成熟技术转向依靠自主研发为主,技术创新的风险越来越大。这时主导的金融安排逐渐变为能够提供大规模资金的大银行,以及能够较好地分散风险的股票市场直接融资。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资金密集产业的赶超,或是金融结构本身的赶超,而背离了上述的最优金融结构,使金融体系的效率低下,难以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有效的服务,甚至导致各种金融危机的发生。

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当由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因为国内和国外资金

的枯竭而不可持续时,经济的停滞,乃至危机的发生也就不可避免。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这些国家都纷纷开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和转型。改革的目标是减少政府的干预,恢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如果这个目标能够顺利实现,那么,各种产品和要素的价格将由市场的竞争来决定,由此决定的价格体系将能反映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市场竞争的结果将会诱使各个企业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和市场需求情况来决定其产业、产品和技术选择,这个经济也就能够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来发展经济。转型前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都有缺乏自生能力,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无法生存的企业。如果这些企业的数量少,产值和雇佣的劳动力有限,那么,可以采用休克疗法,一次性地取消政府的各种干预。虽然,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将会因为原有的保护和补贴的取消而垮台、关闭,但是,原来被抑制的劳动密集产业部门的企业将可因为政府管制和抑制的取消而快速发展起来,新创造的就业机会将可弥补由于缺乏自生能力的赶超企业的破产关闭而失去的就业机会,经济将可迅速恢复增长。反之,如果原有的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数量众多,产值和雇佣的劳动力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甚大,休克疗法的结果不是由于破产的企业和失业的人数太多,使整个经济陷入混乱,就是为了避免过多的失业,政府只好继续给予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各种明的和暗的保护和补贴,结果导致有休克无疗法的尴尬局面。所以,在经济转型时,当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并且所雇用的劳动力的数量太多时,采取一种渐进的、双轨的方式,一方面取消政府对符合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部门进入的抑制,另一方面在未解决赶超部门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前继续给予这些企业一些必要的保护和补贴,将可使经济在转型过程中既保持稳定又获得增长。当然,不管在何种情况下,经济转型的最终完成有赖于企业自生能力问题的根本解决,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公平竞争市场的建立。

任何理论体系都是建立在某些明的或是暗含的假设之上,“凡是存在的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暗含假设,但是由于赶超战略的思想和政策,在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许多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因此,在认识和解决上述国家的许多经济现象和问题时有必要放松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的假设,否则很容易把一些政府为了保护、补贴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而采取的内生性政策扭曲当作外生性的干预,导致改革措施治标不治本,结果不仅事与愿违,而且,可能使情况更为恶化。既然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型经济和发展经济中大量的企业是不



具自生能力的,那么,放弃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中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前提,在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经济和发展经济问题时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为一个具体的变量来考虑不仅在政策制定上十分必要,而且,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必要发展。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为一个具体的变量来考虑,也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了解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是产业和技术结构升级的前提,明晰政府的经济职能,避免继续采用扶持不符合比较优势、不具自生能力的企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使发展中国家能稳定、快速地发展。

二、各篇内容简介

收录在本书的 19 篇论文不是将上述理论思路的某个方面给以数学模型化就是以跨国或跨省的时间系列数据给以计量的检验。这 19 篇文章共分成 6 个部分。除了这 19 篇文章外,还附加了一个怎样利用统计数字来计算技术选择指标以衡量发展战略的附录。

1. 发展战略与经济绩效

这部分包括 4 篇文章,主要从理论上和实证上论述和验证上述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的发展战略对经济绩效影响的假说。

第 1 篇文章《发展战略、自生能力与经济收敛》是作者 2001 年 5 月 14 日应邀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新设立的“D. 盖尔·约翰逊年度讲座”的首讲,约翰逊教授是我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学位时的恩师,多年来他给了我无数的鼓励和支持。约翰逊教授两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后又历任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务长、副校长,对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贡献甚多。为了感谢他所作的贡献,由他先前的一位学生出资,设立这个年度讲座。约翰逊教授在芝加哥大学培养的学生很多,应邀去作这个一年一度的讲座的首讲,无疑是给予我的一个至高的荣誉。我利用这个机会,综述了我从芝加哥大学毕业以后近 20 年来对要素禀赋结构、发展战略、企业自生能力、经济政策环境和体制、经济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心得,并用 1970—1992 年的跨国时间系列数据检验了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绩效之间的关系。计量检验的结果支持了我提出的:发展中国家若采用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将会降低经济发展速度,而使经济发展水平难以符合向发达国家收敛的假说。企

业“自生能力”是我的发展观中的一个核心思想,是从要素禀赋结构和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过渡到经济政策环境和体制的逻辑推论中的关键环节。这个观点在1994年我和蔡昉、李周合著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已经大量使用,但是在这篇文章中则是首度给予了这个词如下的正式定义:“如果一个企业通过正常的经营管理预期能够在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赚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这个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否则,这个企业就没有自生能力。”这篇文章以英文写成,中文稿由胡书东翻译,发表在《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2期(2002年),英文原稿则发表在《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第51卷第2期(2003年)。发表时,计量部分有些改进,因此,和收录在这本书中的中文稿略有不同。

第2篇文章《经济发展战略对劳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是和我的学生——现任职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刘培林博士合作的文章。原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经济中劳均产出增长的两个源泉是劳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在“各经济体技术进步的步伐相同”的假设下,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得出的推论是,由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所以初始劳均资本量较少的经济体的劳均资本积累速度,会相对快于初始劳均资本量较多的经济体,进而,这两个经济体的劳均资本量和劳均收入水平最终会收敛到相同的水平。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进一步的研究认为,初始技术水平落后的经济体,在未来的技术进步速度要比初始技术水平先进的经济体快。但是,如本书前言中的论述以及上篇文章的实证检验,新古典增长理论对劳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收敛机制的分析,抽象掉了政府经济发展战略以及发展战略所决定的经济结构和政策环境和体制的影响。因此,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推论在解释发展中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绩效上有很大的局限。本文放松了“各经济体在给定时期技术前沿相同”的假定,通过构造相应的分析框架,运用1978—2000年期间中国内地30个省区市的经验资料,检验了发展战略对技术进步和劳均资本积累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因为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在顺应比较优势战略从而没有扭曲的情况下,初始劳均资本量较少的经济体在未来时期劳均资本积累的潜在速度,较之初始劳均资本量较多的经济体来得更快;而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将使得实际的劳均资本积累速度低于潜在速度。(2)技术落后经济体顺应比较优势战略,从先进经济体那里选择适合落后经济体自身发展阶段的适用技术进行模仿,所花费的成本低于自己研发这些技术的成本,所以初始技术水平较低的经济体若根据



自身要素禀赋结构的动态变化,确立适当的技术模仿目标,技术进步的速度可以较之初始技术先进的经济体更快;而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将使技术进步的实际速度低于潜在的可能速度。综合起来,初始劳均收入水平较低的经济体,通过确立适当的目标技术进行模仿,与初始劳均收入水平更高的经济体相比,可以在未来时期获得更快的劳均 GDP 增长速度。但是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则会使劳均收入实际增长速度低于潜在速度。这篇文章从另外一个侧面,验证了第一篇文章提出的假说。

本部分的第 3 篇文章《东亚奇迹背景下的中国农村工业化》是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姚洋教授合作的文章,原文发表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Joseph E. Stiglitz 和 Shahid Yusuf 主编的 *Rethinking the East Asian Miracle* (《东亚奇迹的再思考》),中文稿由张鹏飞翻译。农村工业化是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同时也是东亚奇迹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作为这一地区中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在其农村工业化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过去 20 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农村工业部门的高速发展,而中国的农村工业部门又是大量的由乡、镇、村和个人所建立的小规模的农村企业组成的。中国农村工业化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且提出了几种相互竞争的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本文沿着前言理论部分所提出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战略的框架对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提出了我们的解释,并以 1970—1997 年的跨省时间系列数据,检验了其他几种相互竞争的假说,其结论如下:第一,中国的农村工业化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中国的耕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以及由其过去集体化所带来的相对较好的农村基础设施的基础之上的。第二,农村企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中国在过去 20 年所实行的市场化改革。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中国放弃了向大企业倾斜的、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让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空间。第三,城市的轻工业在早期透过技术外溢作用帮助了中国农村轻工企业的发展。第四,在发展过程中,中国农村企业逐步放弃了集体所有制,同时硬化了企业的预算,使其有了相对较好的公司治理制度。

本部分的第 4 篇文章《经济发展战略与中国的工业化》是和我的学生,现在工作于北京大学政府学院的刘明兴合作写的,原文发表于《经济研究》2004 年第 7 期。本文是在上述第 3 篇文章的基础上,以 1978—1997 年跨省的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数据,进一步检验了发展战略对一个地区工业化进程的影响,其结果发现:(1)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放弃了重工业优

先发展战略,对农村工业和国有工业的发展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2) 工业化进程中,无论是对于农村工业还是国有工业,技术选择上偏离理想的资本密集度将损害工业的发展;(3) 公有产权对乡镇企业的发展起到了负面的作用,因此乡镇企业目前正在逐步改革自身的产权结构,以硬化预算约束;(4) 虽然公有制比重的提高可能意味着政府干预的增强,但国有企业与技术选择指数的实证关系说明,发展战略的选择在更基本的层面上决定着经济绩效的高低,而产权并非是最关键的因素。即如果不放弃赶超战略,私有化未见得一定会带来工业增长;(5) 农村工业和国有工业的发展均受制于市场规模的大小;(6) 在同一个省的范围内,国有工业部门的规模越大,结构越偏向轻工业,农村工业的发展就越快。同样,农村工业对国有工业也存在正的外溢效应,尽管乡镇企业的竞争使国有企业的地位相对下降。另外,一省工业结构越偏向轻工业,国有工业的发展速度也就越快;(7) 在对外开放度方面,外国直接投资在农村工业的发展中是一个强有力的解释因素,而对国有工业则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这表明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是乡镇企业的资金来源;(8) 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在具有中等规模耕地面积的省份,乡镇企业的发展要优于耕地面积过少或过多的省份。这些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一个地区或国家的企业技术结构的最优选择取决于相应的要素禀赋结构,而企业的要素投入结构只有与本地的禀赋结构相吻合,才能在技术结构选择上达到成本极小化的目的,进而实现持续的增长和发展。因此,一国工业的发展战略能否充分利用本地的比较优势将决定其长期绩效。发展中国家欲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的目标,应当采取遵循本国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中国政府在发展战略上的转变是近二十多年来工业化成功的关键。

2. 预算软约束与国企改革

本部分也同样包括了四篇文章,专门论述和检验前言理论部分所提出的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形成机制,并讨论国有企业的改革措施。

第1篇文章《自生能力、政策性负担、责任归属和预算软约束》是和原任教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和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现任教于美国南加州大学的谭国富教授合作的文章,英文原文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1999年第89卷第2期,中文译稿发表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4期。本文对社会主义国家预算软约束的存在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国有企业一旦发生亏损,国家(或政府)常常要追加投



资、减税,并提供其他补贴,国有企业经理也预期会得到国家的财政支持,匈牙利的经济学家科尔耐首先讨论了这种现象,并称之为“预算软约束”。关于预算软约束的存在有外生和内生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将预算软约束的存在归咎于各种外生原因,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父爱主义、国家追求就业目标或领导人为了获取政治上的支持,等等;第二种解释将预算软约束视为内生的现象,起因于一个未完工的无效率投资项目,政府或贷款者有积极性追加投资,因为追加投资的边际收益可能大于项目废弃所带来的边际成本。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经济和发展中经济预算软约束现象的普遍存在提出了新的解释:在上述经济中,政府经常为企业赋加非经济的政策性负担,包括由于赶超战略导致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战略性负担和要企业承担冗员或职工养老的社会性负担。由于政策性负担的存在,就会使企业出现政策性亏损,政府对政策性亏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必须给予企业事先的保护或补贴,如果不够,还必须给予事后的补偿。由于激励不相容,企业会把经营性亏损也归咎于政策性负担,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无法分清楚政策性亏损与经营性亏损,只好把企业所有亏损的责任都承担起来,致使企业有了预算软约束。所以,政策性负担是预算软约束的根源,这种现象不管在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经济或是市场经济中都会存在,因此,要消除预算软约束必须剥离赋加于企业的政策性负担。

第2篇《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则是和我的学生李志赞合作的文章,原文发表于《经济研究》2004年第2期。本文把第一篇文章的观点以动态博弈设计了一个数学模型。模型所得出的结论支持了在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的情况下,政策性负担必然会加剧企业经营人员的道德风险,并因而产生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同时,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加深,政策性负担必然使得企业预算软约束问题更加严重,并且更加趋于显性化。模型说明企业预算软约束问题与企业的公有制性质无关,相反,在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的情况下,私有企业会比国有企业更容易产生预算软约束问题,私有企业有更强的激励向政府索取更多的补贴。因而,当国有企业背负政策性负担时,剥夺国有企业经理人员的生产自主权,比如,实行产量配额,往往是一种次优的制度安排。所以,在经济转轨过程中,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要想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就必须剥离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而要剥离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政府就必须放弃“赶超”的思想,并硬化政府本身的财务约束。